



动荡中的智慧： 50 年前的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开幕。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距今已过半个世纪。我们纪念它，因为在这半个世纪中，人类理性又一次觉醒和复苏，步履蹒跚地从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迈进，而变化正是从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之后开始的。

纪念这个会议，还因为这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第一个联合国召开的大会。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地位。一个多月后，联合国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参会邀请。当时，中国正值十年“文革”动乱，人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极左情绪，并不相信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环境危机或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公害是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在此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保持着清醒。当外交部把是否参加人类环境会议的请示送到国务院时，周总理顶住压力，不仅同意参加而且还做出具体的指示。

曲格平先生当时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亲历了这段历史也见证了会议的过程。他回忆说：最初外交部建议让卫生部组团参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当时对环保问题认识的粗浅，认为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只是卫生问题。周总理看了名单后说，这不行，环境问题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所以代表团要有工业、农业、水利、外交方面的人，还要有综合部门的人。他要李先念和余秋里两位副总理来办这件事。余秋里点名

让燃化部副部长唐克率团出席。名单再次报到总理那儿，总理说，领导力量还需要加强，再配一名副团长，从国家计委负责人中出。最终，中国派出了以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为首的代表团参会。代表团组建后提交了《关于出席人类环境会议方案的请示》，强调“环境会议虽然表面上是专业会议，有在环境问题上交流经验、寻求国际合作的一面，但实际上必然反映当前国际上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准备的大会发言稿中，代表团也把批驳资本主义制度罪行作为发言的主旨。

周总理看过“请示”和发言稿后批示说：“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周总理还说，代表团在发言时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成绩，要承认我们现在存在污染环境的问题，要注意学习国外好的经验。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虽然这些话和意见的作用十分有限，但作为一国总理，他并未因此而沉默。

1972年5月30日，由4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斯德哥尔摩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代表团当时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的表现并不如人意，但在那个极左思潮控制神州大地的年代，我们能走出国门，踏上即将启动的人类环境保护的时代列车，实属不易。1973年8月，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以国务院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

规定》。从此，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艰难起步。

我们纪念人类环境会议，还因为这次大会开启了环境与发展领域国际合作的新篇章。

二战后，快速的工业发展在很多国家导致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和恶性污染事件。“八大公害事件”的曝光，引发了工业化国家中科学家、政治家和公众的关注。

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发表，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以大量的事实讲述了有机氯类杀虫剂滴滴涕的使用造成的规模性灾难，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震动。1968年瑞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召开世界环境会议的申请。当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对于瑞典的申请，须由对峙双方的认可才能通过，这在当时可谓天方夜谭。但结果出乎预料，美国和苏联居然不约而同地认为瑞典的提议是个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如此不谋而合，几乎未曾有过。

虽然苏共领导人坚持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但苏联科学家的观点不尽如此。作为政府的科学顾问，他们说服了苏共高层支持瑞典的提议。事实上，美苏两国正共同面临着污染问题。在美国，伊利湖的环境退化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而苏联民众正在质疑那个将对贝加尔湖造成严重污染的开发决定。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两国都颁布了全新法规。苏联建立了 1060 万英

亩的自然保护区保护贝加尔湖；美国则在原基础上建设新保护区，占地 8800 万英亩。到 1971 年，美苏国内要求控制污染和保护自然的选民/公众不断壮大。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议，签署了环境双边协定。

共同的挑战促成了两大敌对阵营在冷战中的合作，并积极投入到人类环境会议的准备之中。

此外，当时除了“北约”和“苏东”两大阵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刚刚摆脱殖民地状态，仍处于深度的贫困和饥饿之中。他们面临更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极度饥饿和贫困，如何提高国民收入，对于环境问题不太关注。有一些国家直接反对召开世界环境会议，认为开如此大会奢谈环境问题是一场富人游戏，是富国阻止穷国发展的借口。

为了争得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支持，大会筹备组于 1971 年 6 月在瑞士的福尼克斯村 (Founex) 举行了一次关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讨论会。参会的 27 位专家均为世界一流，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议形成了著名的《福尼克斯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了环境与发展的概念，回答了困扰人们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292

